

复旦大学博士丛书

自我的觉悟

——论笛卡尔与胡塞尔的自我学说

汪堂家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博士丛书

自我的觉悟

——论笛卡尔与胡塞尔的自我学说

汪堂家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 202 号

责任编辑 陈士强

责任校对 马金宝

自我的觉悟

——论笛卡尔与胡塞尔的自我学说

汪堂家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25 字数 156,000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309-01454-5/B.63

定价: 10.00 元

前言：激活你心中的传统

德尔菲神庙有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奥古斯丁把这句话重新表述为：“毋需外索，而要内求。真理居于人的内心。”（*Noli foras ine in te redi, in interiore homine habitare Veritas*）。自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重续了古希腊罗马哲学要求人们反观自照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经过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的改造获得了崭新的意义。不管我们站在哪种角度去评判近代西方哲学的得失，我们终归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近代哲学与近代科学是同源的，它转向以主体主义为特征的认识论符合近代科学的深刻要求。虽然现代哲学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反主体、反中心论的倾向，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构成了对近代哲学的反动，但是，近现代哲学之间根本不存在不可弥合的“认识论的断裂”，这不仅是因为现代哲学从近代哲学中接受了许许多多的重大问题，而且直接接受了某些重要概念和未曾发挥的萌芽性思想。过分夸大它们的裂痕，既不利于我们把握哲学史的真实面貌和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也不利于我们把握现代哲学的深刻渊源。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使自己的哲学研究充满强烈的历史感，不可能把自己的思想扎根于深厚的传统土壤中，不可能摆脱狭隘的哲学史观的束缚，从而不可能使当前的哲学史研究更加富有现代意义，也不可能创造什么真正属于自己和自己时代的思想。相反，我们的观点只能流入浮泛无根和主观任性的状态。

思想传统只有在不断的更新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统。

增强我们思想的现代意识首先得让传统活起来，让它活在我们的心中。就像我们对西方哲学的探讨最终只有落实到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让它生根于这种传统才有根基、有价值和意义一样，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探讨必须落实到现代哲学的基点上来。只有透彻地理解别人，才能深入地理解我们自己；只有化身于传统之中，才能真正地超越这种传统。如果听命于自己思想的随意性而无视传统本身的客观发展，我们将永远游离于有根的思想之外。

坚持主体主义构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我们当然有理由像海德格尔和罗素等人那样把主体和主体性概念看成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历史产物，但是我们无法回避并且也不应回避近代哲学提出的主体性问题，因为主体性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把人规定为主体也就意味着把世界规定为对象，这一点与近代西方社会要求发展科学、征服自然的时代潮流相适应。近代哲学把人规定为主体，反映了人们要把自己从自然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作为独立的个体控制自然、利用自然的强烈愿望。不管近代哲学家对主体的看法多么狭隘，不管他们用主体性概念来界定人如何片面，不管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制造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分裂与对立，我们毕竟得承认，人认识自身是认识外部世界的客观需要，而认识外部世界最终还是为了人自身。只有从主体性问题入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近代哲学的基本走向；也只有从主体性问题入手，我们才能理解现代哲学为什么要站在新的立场上，去解决近代哲学遗留的问题。

追求确实性是近代哲学转向主体性的根本动机。这不仅是因为以理性为核心内容的主体性被近代人看成了知识得以产生的根本条件，而且是因为主体性被看成了知识确实性的最终根源。因此，在近代哲学中，追求确实性与开拓主体性的过程是一致的。

“主体性”决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蕴涵着丰富内容的谜中之谜。从笛卡尔开始，西方哲学家们就力图揭开主体性的

谜底，穷究主体性的结构与内涵。无论把主体理解为小我还是理解为大我，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主体被理解为不同于物质的纯精神的东西。既然人贵在求知，那么哲学以精神本身为对象绝对没有什么错误。精神是自然进化的最高成就，它的精奥玄妙胜过任何一种鬼斧神工般的自然造化。它显示了自然的奥妙，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遗忘了自己，这不能不说是悲哀。心非万物，但能照万物，心非圣灵，但能造圣灵。世间有此奇迹，人怎能无动于衷？

奇迹本身就是魅力。当近代哲学家惊叹于这种魅力，醉心于这种魅力时，他们首先想解答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人的知识的获得如何成为可能？知识的确实如何成为可能？真理的探求如何成为可能？然而，他们独独没有探问，人生的意义的实现如何成为可能？

笛卡尔开辟了近代主体论哲学的先河，他所提出的主体性原则通过休谟和康德的工作而在胡塞尔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可以这样说，笛卡尔和胡塞尔一头一尾界划了主体主义的传统。胡塞尔本人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勒内·笛卡尔通过他的《沉思录》给先验现象学以新的推动；它们的研究对已发展起来的现象学向新的先验哲学的转变发生了直接影响。因此，人们几乎可以称先验现象学是一种新笛卡尔主义。”^①由于胡塞尔继承了笛卡尔的彻底精神，全面贯彻了笛卡尔提出的主体性原则，我们可以从哲学的基本倾向着眼，把他看成最后一位近代哲学家。然而，胡塞尔又是一位极有现代味的哲学家。他不仅能够继往而且能够开来。一方面，他为蔚为热潮的现象学运动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在语言分析方面所作的贡献，足以与任何一位分析哲学家的成就相媲美。

① 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海牙1982年英文版第1页。

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试图从笛卡尔和胡塞尔这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入手，探讨西方哲学转向主体性的内在根源，分析西方主体主义的一般问题和方法，展现从笛卡尔开始，经过休谟和康德再到胡塞尔的自我概念的递嬗演变，揭示西方主体主义哲学的潜在矛盾和理论困难，阐明我自己对待主体性问题的基本态度和当代思想家的紧迫任务。

目 录

前 言 激活你心中的传统	1
第一章 确实性的追求与主体性问题的缘起	1
第一节 确实性的理想与近代哲学的命运	1
第二节 确实性的追求与近代哲学的数学化尝试	11
第三节 笛卡尔的确实性概念与主体性问题的提出	20
第四节 从确实性到明证性：胡塞尔的解释	31
第二章 回归自我之路：从笛卡尔的怀疑到现象学的还原	45
第一节 笛卡尔怀疑法的实质	45
第二节 笛卡尔的怀疑法对现象学的意义	55
第三节 现象学的悬置与还原	62
第三章 从实体性自我概念的产生到先验自我的确立	76
第一节 实体性自我概念的形成	76
第二节 实体性自我的解体	91
第三节 自我功能化倾向的产生	101
第四节 先验自我的确立	109
第四章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122
第一节 从“我思故我在”到“我生即我思”	122
第二节 我思与我思对象：主体的意向性结构	135
第三节 主体间性与他人问题	153
第五章 主体主义传统的消解与中西哲学的合流	164
第一节 主体主义传统的理论困难和历史后果	165
第二节 主体主义传统的消解与中西哲学的合流	177

参考书目	187
后记	190

第一章 确实性的追求与主体性问题的缘起

自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追求确实性的运动，这一运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而且改变了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同时也危及传统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如果说追求确实性是近代科学的本质，那么，近代哲学向自身提出科学化的要求也就意味着将科学的确实性理想引入自身，哲学数学化则是近代哲学家追求确实性的突出表现。尽管这样做不可避免要导致失败，但它在客观上促进了科学主义精神的形成。

然而，近代哲学也正是在探求确实性的努力中创造了主客体二元分裂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反映了在近代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分裂乃至对立。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为了寻求确实性的根据而把目光从自然转向人心。于是，哲学思考的重点从传统的本体论转向了以探讨主体性问题为中心的认识论。毫不夸张地说，对确实性的追求是形成近代西方主体主义传统的最初动因。

第一节 确实性的理想与近代哲学的命运

随着近代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医学、力学等学科不断从统一的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人们不再像希腊人那样固守对世界的统一性的模糊认识，而是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精确研究。由

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等人发起的科学革命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其基本标志是，人们普遍相信自然受统一的永恒法则的支配，这些法则可以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进行表达。当近代人从层出不穷的科学成就中获得鼓舞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科学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利益，而是科学以无可争议的方式解决了他们长期争论不休的模糊问题，从而使他们获得了确实的无可置疑的知识，正是这种确实的知识打消了他们对探索宇宙的疑虑，也正是这种确实的知识使他们渐渐意识到哲学与科学的本质区别。现在，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从事全面的研究工作，并且相信自己的研究总有一日会产生令人信服的确定结果。近代科学的发展表明，这一信念的确立是整个近代科学工作的基本前提。

科学的独立发展与确实性观念的产生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说近代科学史即是追求确实性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解答科学是什么的问题时理应把确实性作为衡量一种知识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重要标准。实际上，近代哲学之所以要转向以探究主体性为中心的认识论，正是因为它力图由此揭示科学的确实性的最终根源。我们无法考证是谁第一次使用“科学”一词，但从词源学上看，“科学”原本具有认识的意思。今天英文中使用的 Science 源于拉丁文，其词根是 Scire，意指认识或知识。而德文的 Wissenschaft（科学）则完整在保留了“认识”（Wissen）这层涵义。就“科学”是指知识或认识而言，它的外延比哲学更为宽泛，因此，现代人用它来统称一切知识部门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人们心目中的科学远不是指泛泛的知识，而是指以确实性为特征的知识，具体地说，是指以数学为样板并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

在这一点上，康德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康德始终都不愿停留在经验的范围内去寻找科学知识的确实性的根据，也没有就认识论来讨论认识论问题，而是认定科学知识的基础只能在科学之外。因此，他不仅提出了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提出了

一般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当他向我们表明数学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并不是不言自明而是需要加以批判和审查时，他实际上已经把确实性问题作为认识论问题加以优先考虑，并潜在地规定了科学与确实性的内在关系。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康德甚至这样写道：

“只有那些其确实性是无可置疑的科学才能成为本来意义上的科学；仅仅具有经验的确实性的知识只能在非本义上被称为学问。……不过，如果在科学中，例如在化学中，这些基础或原则最终不过是经验的，并且理性用来解释现存事实的那些法则仅仅是经验法则，那么，它们就不具备自身必然性的意识（没有无可置疑的确实性），因而，在严格意义上讲，这个整体也就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①

在此，康德明确把无可置疑的确实性作为规定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其意义不下于他后来所发动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不论是在康德所处的时代还是在今天，人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条标准对科学进行划界，尽管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模糊数学的产生已使人们改变了对确实性的看法，特别是使人们不再将确实性等同于精确性，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有损于确实性标准本身的尊严。

那么，科学的确实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当哲学也要求把自己变成科学，从而将获得确实性作为自己的理想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确实性”在英文中被称为 Certainty 或 Certitude，也有些人称之为 Validity。在近代人眼里，一种知识要获得确实性就必须满足三个基本要求：一是精确性；二是自明性；三是普遍必然性。因此，在近代哲学实现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折之后，它首

^① 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前言，三联书店1988年。

先要对科学知识的确实性问题进行反思，具体地说，要分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就必须探讨知识的精确性、自明性和普遍必然性问题，特别是要探讨它们如何可能的问题。这是因为科学本身并非完全自足的知识体系，科学的规范并不是科学本身所提供的，所有科学的一般方法和原则也不是科学自生的；其次，科学从不思考自身的确实性范围，也不追问它的有效性程度，更不讨论它自身为什么能切中（treffen）外在的对象。由于近代实验科学的独立，人们还不得不尽可能地解决经验科学与非经验科学的衔接问题，否则，非经验原则在经验领域的应用就成了不合法的事情。

近代科学可以分为事实科学和本质科学，前者以自然领域的个别事实为对象，它的最终根据在于经验，确切些说，在于以感知活动为内容的经验直观，后者则是以非经验的东西为对象的科学，如逻辑学和数学，它们既不以经验的材料为内容，也不以经验的方法为方法，它们的思想构造摆脱了对既有事实的完全占有。就几何学而言，它的任务几乎与收集事实材料无关，它所考虑的空间关系必然是非经验的。比如，我在黑板上画的几何图形恰恰是由几何公理决定的，这些公理并非偶然的事实，而是独立于对这类图形的经验，经验归纳并不能得出三角形的三角和等于 180° ，它们的关系是必然的并且其必然性是由三角形的本质决定的。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下去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几何学知识的这种必然性究竟是怎样取得的？几何学的可能性需要靠什么来保证？包括几何学在内的一切非经验科学如何与经验科学相关？经验科学与非经验科学的相安无事是否表明它们原本就有一个统一的基础？

这些问题显然是科学本身无法回答的。这就需要一门既独立于各门具体科学又能给科学以统一的学科，这门学科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确切些说，是作为近代哲学重心的认识论。这种

认识论不仅以科学知识本身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而且将科学的确实性理想引入了哲学，从而使哲学本身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随着科学的确实性问题的提出，哲学必须对确实性的三大要素，即精确性、自明性和普遍必然性分别进行探讨，这是近代哲学所面临的新的任务。关于认识的精确性和自明性，人们可以从日常事务和数学计算中得到直接的了解。比如，人们可以在测量、计数以及使用工具的活动中明白精确性和自明性意味着什么，一个人从来不会怀疑他自身存在以及他所生活的世界的存在的自明性。因此，将精确性和自明性作为科学的品格对近代哲学来说已经不成为问题。剩下的问题是，哲学应怎样解释知识的普通必然性或有效性问题。在近代人眼里，知识只有具备精确性和自明性才能成为科学知识，但一种知识要成为科学还必须具有普遍必然性或有效性，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或有效性问题是与真理问题密不可分的，因为只有真理性的认识才有普遍必然性可言。

但真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这几乎是近代所有哲学家的共同观点。一旦我们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考虑问题，对主体性本身的探讨也就变得迫切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客观是相对主观而言，离开了主观，客观的东西也无所谓客观，而且是因为“客观”的意义最终还要通过主观来规定。主观和客观的分野既标志着对象性思维模式的形成，也意味着真理问题的解决找到了自己的入口。在近代哲学中，真理被理解成一种关系，确实性恰恰体现在这种关系之中。如果对象的显现是精确的、自明的，如果主观的观念普遍必然地契合于对象，我们就可以说这种观念具有真理性、确实性。

因此，按照近代符合论的真理观，对确实性的探求不可避免以主客体的二分为基础，二元论则是主客体二分的极端表现。“客体”或“对象”（Gegenstand, object）一词的原义再清楚不过地

反映了近代哲学走向肯定主客体二元分裂的思维模式的可能性。Gegenstand 和 object 均有“对置”和“反对”的意思。因而，设置了对象也就意味着设置了它的对方，即主体，但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不仅是因为它是与对象同在的被设置者，而且是因为它既是对象的设置者。又是自身与对象的关系的设置者。伽利略、笛卡尔和洛克的工作充分体现了近代思想家从确实性的追求中导出主客体分离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所蕴涵的二元论倾向。

众所周知，伽利略为了求得数学化的确实可靠的知识而将自然看成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纯粹物体的总体性，它受统一的因果律的支配。因此，伽利略实际上已在暗中把一切精神性的东西逐出自然界。在他区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之后，心与物的分离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伽利略认为，被称为第一性质的事物的运动、状态和数量关系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客观实在，而被称为第二性质的颜色、声音、气味等等则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而是人的主观产物，这样一来，伽利略就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严格地区分开来。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追问这样的问题：数学化的确实性知识是如何可能的？既然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属不同的领域，那么，我们如何保证对它们的认识的普遍有效性？主观的东西怎样才能与客观的东西相一致呢？

与伽利略相比，笛卡尔的思考似乎更深一层。他认为，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承认数学自然科学知识的确实性，我们还必须进一步为这种知识的确实性寻找根据，否则对科学的辩护将失去效力。在他看来，知识的最终确实性只能来自心灵本身。而且，这个心灵不可能与外物有任何共同之处，否则它就会受到物的不确实性的干扰而成为可疑的东西。由此可见，笛卡尔的二元论是他根据主客体二分的思维模式追求确实性的逻辑结果。尽管他本人提出了从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逻辑地推演出其他具体科学的理想，但他的科学实践远远没有实现这一理想。在形而上学中，笛

卡尔把经验和想象贬得一文不值，而在物理学中他却大肆强调想象的作用；在形而上学中，他拒绝任何具有或然性的东西，在物理学中他却一反初衷地运用或然性较大的假设。从本质上说，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与物理学之间的确实性缺乏内在的连续性。因此，他并没有完成成为科学知识的确实性提供最终基础的任务。

洛克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解决确实性的各个层次的连续性问题，但他最终还是陷入了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窠臼。他按确实性程度把知识分为四个等级^①。最高级的知识是直观知识，它是最清楚最可靠的知识。第二级的知识是证明的知识，这种知识虽然也是确实可靠的，但一开始并不像直观知识一样一目了然，而必须经过推理过程才能显示它的正确性。第三级的知识是对于特殊存在的物的感性知识，这种知识虽然超出了单纯的或然性的范围，但并没有前两种知识的确实性。第四级的知识是或然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模糊的、可疑的，因而算不上真正的知识。洛克认为，这四级知识只能停留在观念的范围内，并且最终超不出经验的范围，但经验毕竟是摇摆不定的，知识以这种摇摆不定的东西为根据怎么可能获得最终的确实性呢？而且，由于洛克重复了伽利略对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并声称不可能发现这两种性质之间的联系，他也就很难把这两种性质的知识连接起来。这样，认识论上的主客体二元分裂势必不可避免。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近代历史条件下，二元论的出现恰恰是人们在追求确实性时将主客体截然二分的逻辑结果。这种二元论是人与自然的分裂在哲学上的反映，如果说近代思想家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理智的启蒙，其目标是唤醒人的独立精神，那么，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突出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的物我不分的模糊思

① 洛克《人类理智论》，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270页。

维向物我相分的清晰思维过渡，并由此推动了知识的分工过程。近代心理学和近代物理学就是在确认“心理”和“物理”的重大差别的前提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他学科的独立发展或多或少与心物二分的思维格局相关联。由此看来，心物二元分裂的思维模式起过推动知识分工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将主客体对立的倾向，将人与自然的分裂肯定下来。

由于数学的示范性作用，人们首先将知识的确实性标准与哲学自身相对照，这一方面促进哲学向自身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改变了哲学与科学的相互关系。以前人们一直把哲学视为科学的皇冠，现在哲学家们纷纷宣称自己的理论就是科学。即便是极力宣扬思辨精神，强调哲学与科学分野的绝对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也不能不将自己的哲学挂上科学的招牌。尽管他宣称哲学是一切科学和真理的中心，但他不无遗憾地发现，哲学的实质已经败坏了、消失了，哲学的神圣光明已经熄灭了、沦落了。对他来说，拯救哲学的唯一出路是使哲学适应科学的深刻要求，把科学所追求的确实性作为哲学的理想。正因如此，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思辨科学，并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普遍原则、规律和分类加以承认和利用以充实哲学自身的内容。

然而，哲学所固有的模糊性和不确实性与科学的自明性、确实性之间的强烈反差使人们对科学的迷信和对哲学的漠视与日俱增，也使哲学不得不按科学的确实性标准来要求自己 and 规范自己。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不问是恪守人文主义传统的欧洲大陆哲学家还是注重经验和分析的英美哲学家，之所以同时指斥传统哲学是应予抛弃的形而上学，其根本原因是，他们都一致地看到传统哲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前提和一般原则均缺乏科学的确实性。哲学之所以长期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并被迫成为科学的附庸也正是因为哲学本身没有科学所要求的那种确实性，因此，它千方百计把确实性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维也纳学派所制定的意